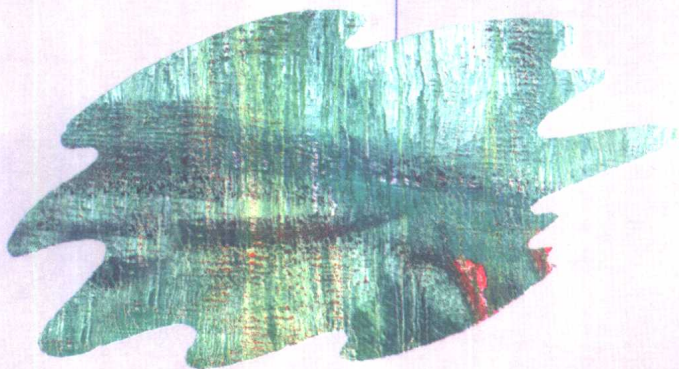


HUIYANJIUCONGSHU

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丛书

[美] 黄宗智 著

长江三角洲 小农家庭 与乡村 发展



CHANGJIANGSANJIAOZHOU
XIAONONGJIATING
YUXIANGCUN
FAZHAN



长 江 三 角 洲

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美〕黄 宗 智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美)黄宗智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ISBN 7-101-02314-2

I. 长… II. 黄… III. 农村经济-经济史-研究-长江-三
角洲 IV. F3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48549号

This translation of the author's *THE PEAS-
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is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 李丹慧

长 江 三 角 洲
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美〕黄宗智 著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发 行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1/32·14⁵/4印张·345千字
2000年6月第1版 200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定价: 21.00元

ISBN 7-101-02314-2/K·960

NAE04/03

中文版序

历史研究必须联系理论,但理论,尤其是政治化了的理论,很容易成为探索历史真实面貌的障碍。在研究过程中,我一直执着从史实到理论而再回到史实的认识程序,避免美国社会科学为模式而模式的陋习。我力求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寻求最重要的概念,再回到事实中去检验。对现存各家各派的理论,争取去误存真,建模式于实际。在这个基本的方法上,此书与拙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是一致的。

本书的出发点是 30 年代的实地调查资料,尤其是费孝通、林惠海和日本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门对长江三角洲 8 个村庄的研究。这些资料翔实细致,非一般历史文献资料可比。我试图在这条基线上,结合江南地区比较丰富的文献资料,追溯明初以来的一些主要变化。这个研究方法也是与《华北》一书一致的。

与《华北》不同之处在于应用了我自己 1983 至 1985 年在松江县华阳桥乡的薛家埭等 6 个自然村的调查,考察了 30 年代至今日的变化。我相信跨越革命前后的这条研究鸿沟会对阐明两半部分都有帮助。同时,本书着重把江南和华北对照相比。

在华阳桥乡调查的一切安排,都由南京大学吕作燮教授和松江县外事办公室陆敦根同志承担。罗崙教授参加了第一年的调查。严学熙和周国伟两位先生和我方周锡瑞、裴宜理合作研究工业、民众集体活动和政治。陈忠平同志则和顾琳合作,研究商业与华阳桥

镇。本书虽然没有引用他们诸位的调查资料(除了第 12 章注明的一节之外),但我在认识上和精神上都受惠于协作的诸位同仁许多。我个人的调查,主要在薛家埭等村内进行,采用的是仿效满铁在华北调查的方法,每次围绕几个预定的题目座谈,但也随时追踪原定范围之外的线索。这样的调查,关键在于虚心和具体的问讯。调查期间,当地前大队支部书记何勇龙同志对我帮助至多。

我们原计划要出一部与仁井田陞根据满铁在华北的调查所编的资料集(《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相类似的书。全部调查的问答记录、统计资料、按户调查以及为出资料集而挑选的各节问答记录,都由南大吕先生保管。国内出版情况若能改善,这些资料也许有可能发表。

在前人有关江南的大量的研究之中,我得助于吴承明先生的商业研究和徐新吾先生的手工业研究至多,在有关各节都有注明。此外,本书亦受益于我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几位博士生的研究。正文之中引用了夏明德、武凯芝和叶汉明的博士论文以及程洪、李荣昌和卢汉超的研究论文,都有注明。程、李、卢三位更承担了此书的翻译,由程洪统稿。谨此向他们致衷心的感谢。译稿经我自己两次校阅,应基本准确。

黄宗智

目 录

中文版序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编 1949 年以前	21
第二章 长江三角洲的生态系统	21
第三章 商品化与家庭生产	44
第四章 商品化与经营式农业	58
第五章 商品化与过密型增长	77
第六章 农民与市场	94
第七章 帝国主义、城市发展与农村过密化	118
第八章 两种类型的村社	148
第二编 1949 年以后	167
第九章 旧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造	167
第十章 集体、家庭与副业生产	200
第十一章 农业的增长与发展	223
第十二章 乡村工业化	255
第十三章 乡村发展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的斗争	269
第十四章 半农半工的村庄	291
第三编 结语	305

第十五章	一个总结	305
第十六章	几点思考	325
附录A	长江三角洲 8 个村庄的社会经济轮廓	335
附录B	长江三角洲的人口与耕地面积	337
附录C	明清和民国时期上海地区镇市的形成 与演变	341
附录D	华阳桥种籽场大队的农业外就业 (1950—1985)	347
附录E	华阳桥公社以及中国乡村总产值构成 的变化	360
附录F	集体、联户和个体企业的收入	364
引用资料		366
访问座谈		366
约谈村民		381
引用书刊目录		384

附表目录

正文表

2.1	太湖盆地的旱涝灾(901—1900)	32
4.1	长江三角洲 8 个村庄的雇农(1939—1940)	59
4.2	长江三角洲 22 个乡村的雇农(1949)	60
4.3	河北—山东西北部和长江三角洲的雇农 工资(1929—1933)	65

4.4	直隶、山东、江苏、浙江以及全中国涉及 长工的命案(1721—1820).....	68
5.1	上海县的粮价(1632—1682).....	83
5.2	上海县的棉价(1621—1684).....	84
5.3	苏州府和松江府的稻米产量(1023—1850).....	89
5.4	中国的商品贸易量(约 1840)	91
6.1	华北和长江三角洲 6 个村庄农民出售的 主要商品(1936,1939)	95
6.2	华北 3 个村庄农民购买的商品(1936)	96
6.3	长江三角洲 3 个村庄农民购买的商品 (1938)	97
6.4	长江三角洲 3 个村庄农民购买的商品 (1939).....	98
6.5	华北和长江三角洲 9 个村庄的主要作物 (1936—1939).....	101
6.6	华北和长江三角洲 6 个村庄的棉布消费 (1936)	102
7.1	米厂村棉花、高粱、玉米、小麦和大麦生产 的单位面积及单位劳动力收入(1937).....	127
7.2	中国人均布消费(1840—1936).....	139
9.1	土地改革时薛家埭等 6 个村的中农和贫农 户数(1950·6)	169
9.2	华阳桥种籽场大队的党政领导(1956—1985)	180
9.3	华阳桥种籽场大队各生产队队长及其入 党情况(1956—1985)	181
9.4	华阳桥种籽场大队记工标准(以年龄和 性别为依据, 1983)	184

9.5	华阳桥公社农民口粮月定额(1985)	185
9.6	西里行浜生产队的主要领导(1956—1984)	189
10.1	华阳桥公社和种籽场大队的结花 (1968—1985)	209
10.2	华阳桥种籽场大队人口中务农劳动力的 比例(1965—1984)	211
10.3	华阳桥种籽场大队的人口和全劳动力 (1965—1987)	212
10.4	松江县国营商店收购的兔毛(1966—1984)	216
11.1	松江县及中国主要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 (1952—1987)	226
11.2	松江县单季稻、早稻、晚稻播种面积 (1949—1984)	228
11.3	松江县小麦和大麦、棉花、油菜播种面积 (1949—1984)	229
11.4	许步山桥生产队的工分值(1965—1983)	240
11.5	松江县及中国主要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 指数(1952—1987)	243
11.6	上海直辖市及中国的化肥应用指数 (1952—1986)	252
12.1	华阳桥公社各企业职工人均资本额、总收 入和工资, 及与国营工业企业的比较 (1983)	259
13.1	华阳桥公社主要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 (1956—1983)	274
13.2	中国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播种面积 百分比(1952—1986)	284

14.1	江苏省七县 190 小城镇人口普查(1985 · 6 · 30)	293
------	--	-----

附录表

A.1	长江三角洲的 8 个村庄	336
B.1	松江、苏州府,太仓州,无锡、江阴县人口 及耕地面积(1393—1932)	339
B.2	松江、苏州府,太仓州,无锡、江阴县人均 耕地面积(1393—1932)	340
C.1	上海地区镇市的发展(1911 年以前及民 国时期)	343
C.2	上海地区镇市的形成(1850 年以前)	343
C.3	上海地区镇市的形成与演变(1862—1937)	344
D.1	薛家埭生产队的农业外就业人员(1950 —1985)	347
D.2	许步山桥的农业外就业人员(1950—1985)	351
D.3	西里行浜生产队的农业外就业人员 (1950—1985)	353
D.4	华阳桥种籽场大队各生产队村民的农业 外就业(按企业划分)(1950—1985)	356
D.5	华阳桥种籽场大队各生产队村民获得农 业外就业机会的途径(1950—1985)	357
D.6	华阳桥种籽场大队各生产队村民农业外 就业的性别比例(1950—1985)	359
E.1	华阳桥公社与全国乡村的总产值构成的 比较(1971—1986)	361
E.2	中国乡村总产值(1985—1986)	362

E.3	华阳桥种籽场大队的总产值(1977—1984)·····	362
F.1	若干地区乡村各类组织形式的企业的总收入(1986)·····	364
F.2	全国乡村各类组织形式的企业的总收入(1984—1986)·····	365

地 图 目 录

1.	1980 年的长江三角洲·····	22
2.	1820 年的长江三角洲及本书研究的 8 个村庄·····	23
3.	长江三角洲的地形·····	24
4.	长江三角洲的稻、棉栽培(1930)·····	25
5.	长江三角洲的历史地理·····	26
6.	华阳桥薛家埭等 6 个自然村(松江县, 1940)·····	150

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

——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412

第一章 导 论

在 1350 至 1950 年长达 6 个世纪的蓬勃的商品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以及在 1950 至 1980 年的 30 年集体化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先进地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农业长期徘徊在糊口的水平。只是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质的发展才真正在长江三角洲农村出现,并使农民的收入相当程度地超过了维持生存的水平。本书旨在探讨长江三角洲农民糊口农业长期延续的过程和原因,及其变化的过程和原因。我将着重分析农民的生活状况,而不是整个经济的毛收入或全部人口的人均收入。重点在于一个特定地域和社会阶层的发展与不发展,及其对中国历史总体、以及对农民社会和经济的各派学术理论的意义。

经典理论: 斯密和马克思

亚当·斯密(1723—1790 年)和卡尔·马克思(1818—1883 年)尽管有着明显的分歧,却共同认为商品化会导致小农经济的质的变化。^[1]斯密认为,自由的市场竞争和个人致富的追求会导致劳动分工、资本积累、社会变革,乃至随这些而来的资本主义发展。马克思的观点与此类似,商品经济的兴起会引进资本的时代。

马克思进而把小农农业等同于“小”生产,把资本主义等同于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商品经济的发展会伴随着以拥有生产资料的资产者与他们的无产阶级劳动者为对立双方的、资本

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即使斯密没有这样去关注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他在相当程度上持有同样的观点: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会导致资本“改进”和规模经济(斯密 1976[1775—1776],第1卷:特别是第7—16页)。^[2]

当然,斯密和马克思的共识很大程度上基于英国的经验。小农场随着商品化而让位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农场毕竟是英国圈地运动和18世纪农业革命的实际经历。斯密和马克思的共识于是在实证之上逐渐形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个规范认识,似乎达到了毋庸置疑的地步。

甚至革命的俄国和中国也从同样的认识出发。列宁直接引用马克思的说法,力主革命前俄国的商品经济已与农民向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和农村无产者两极分化同步发展。在列宁看来,无论在俄国,还是在英国,小农经济只能是停滞的和前商品化的经济,而商品化只能带来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分化(列宁1956[1907])。他的继任者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化是避免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病、同时又使小农经济现代化的唯一办法。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能够解决资本主义分化的问题,而集体化农业能够把农民的小生产转化为高效率的大规模农业经营。

毛泽东接受了相同的公式和选择。社会主义的集体化被视作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发展之外的唯一途径,而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的其他乡村发展途径的可能性不加认真的考虑;同时,也没有考虑糊口性的农业会在商品化或集体化之下持续的可能(毛泽东 1955a, b)。

中国的学术研究

毛时代中国的学术研究为上述的经典模式所支配。“封建经

济”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等同于商品化的大生产。这一模式的特殊的中国式的结合体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据这一分析，“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发生差不多与近代早期的英国和欧洲同时，要不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打断了这一进程，中国也会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据此，中国历史被纳入了斯大林主义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交替演进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另一可能的说法是西方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发展，这触犯了多数人的爱国感情。）

在上述主要的理论信条下，解放后中国农村史研究的第一代学者首先关注明清的商业发展，开展了鉴定主要贸易商品以及对其作量性估计的出色研究，尤其重在那些长途贸易和城乡贸易的商品，以此考察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把其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始于 50 年代的研究的成果，在 80 年代终于开始发表。^{〔3〕}

解放后第一代的其他一些学者寻找经典模式预言的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在 50、60 年代的官方政治理论中，生产关系被认为是马克思提出的人类历史上一对主要的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中的决定性方面。它设想，要是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封建”关系能被证实让位于劳资间的资本主义关系，便可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出自这一分析框架，对明清雇佣关系的发生整理出了很多实证（中国人民大学 1967；南京大学 1980）。^{〔4〕}

在改革的 80 年代，研究的重点转向“生产力”的发展，反映了新的政治理论强调生产力，而不是生产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新一代学者开始寻找伴随着商品化而来的生产率提高的证据。随着蔓延着的对集体化农业的非议，他们回到他们想到的唯

一的替代途径：市场和资本主义。如果明清时代的商品化真带来了农业发展，那么今日的农村也应采用同样的做法。这一新的学术倾向的突出代表甚至争辩说清代长江三角洲总体上的经济发展超过了“近代早期”的英国(李伯重 1985a, b, 1984)。

关于清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中国学术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得到了呼应。美国新斯密学派的日益普遍的设想之一坚持说伴随着清代市场扩展而来的变迁应视作“近代早期”的发展，相当于 16 至 19 世纪英国和西欧的发展阶段。这一观点把中国并入一个通用的现代化模式，而把清史作为中国的“近代早期”史。^[5]

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有许多值得赞许之处。在我看来，它的成功之处在无可怀疑地证实了 1350 至 1850 年间长江三角洲在围绕着本书称作“棉花革命”的过程中经历了相当程度的商品化。它也考证了清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相当大的变化。清代中国城市、工农业中雇佣劳动的实际增长现在也没有疑问了。

然而新的研究未能证实单位劳动力的生产率和收入有所改进。尽管明清时代出现了蓬勃的商品化，处于糊口水平的小规模家庭农业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如同我在别处指出的，华北平原 18 世纪初至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商品化而出现的经营式农场仅在使用雇佣劳动上类似于资本主义企业，它们明显地无法在生产率上有任何真正的进展，无论是通过规模经济、增加投资，还是改进技术(黄宗智 1986)。长江三角洲也是这样，仅敷糊口的农业持续着，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的改进。事实上到 20 世纪，那里的小农农业生产排挤了明末以前相当流行的大规模雇佣劳动生产。

简单的事实是，斯密和马克思从英国经验中作出的预言未在中国发生，也未在第三世界的多数地方发生。糊口水平的家庭农作非但在随着帝国主义时代和形成统一的“世界经济”而来的蓬勃的商品化过程中延续，而且它至今仍存在于世界的许多地方。即

使在欧洲大陆,尤其在法国,小规模的小农生产也远比在英国持续得长久(布伦纳 1982)。

我们需要把商品化与质变性发展区分开来。长江三角洲的历史记载表明小农经济能在高度的商品化条件下持续。易言之,小农生产能够支撑非常高水平的市场扩张。商品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发展的经典认识明显是不对的。

两个现代派别: 蔡雅诺夫和舒尔茨

当代小农经济理论的两大主要学派是以 A·V·蔡雅诺夫(1888—1939 年)和西奥多·舒尔茨(1902 年生)为代表的。两个学派都承认现代市场经济下小农经济可能持续的事实,从而区别于斯密和马克思。问题是如何和为何,以及如果光是商品化不能导致质变,那么小农经济怎样才能转化呢?

与马克思、列宁以及斯密相反,蔡雅诺夫认为在国民经济商品化的过程中,小农的行为仍继续不同于资产者。他指出,小农家庭农场在两个主要方面区别于资本主义企业:它依靠自身劳动力而不是雇佣劳动力,它的产品主要满足家庭自身的消费而不是在市场上追求最大利润。因为它不雇佣劳动力,因此难以核算其工资与收益;因为它的投入(家庭全年的劳动力和资金投入)与产出(全年总收获)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无法衡量其单位生产成本与收益。它对最优化的追求采取了在满足消费需要和劳动辛苦程度的平衡之间,而不是在利润和成本间。^[6]因而,蔡雅诺夫坚持说“小农经济”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系,遵循着自身的逻辑和原则(蔡雅诺夫 1986[1925]:特别是第 1—28,70—89 页)。

这样的经济按照一个个家庭的人口周期而分化,不按列宁想象的通往资本主义的模式分化。蔡雅诺夫以俄国的小农经济为例

证指出，社会的分化并非来自商品化带来的农民分化成富农和农村无产者，而是来自家庭周期性的劳动者与消费者比例的变化。没有子女的年轻夫妇享有最有利的比例，直至他们的不会工作、单纯消费的子女的出生。当孩子长大并参加生产，一个新的周期又开始了(同上书，第1章)。

蔡雅诺夫认为，俄国小农经济改造应采取的方式既不是斯大林主义的集体化，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生产，而是由农民自愿地组成小型合作社，这既能克服农民小生产的弊病，又可以避免大规模集体化农业的官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化和垄断倾向(沙宁 1986:7—9)。

蔡雅诺夫的论点在斯大林主义的统治下被压制(沙宁1986; 斯罗门 1977)，要不是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地方小农经济至今仍持续着这一重大事实，他的理论也许会随着他的逝世而消失。蔡雅诺夫理论传统的继承者首先主要是研究前工业化时期偏僻地区的人类学工作者。他们在人类学领域以“实体主义者”著称(多尔顿 1969)，指出小农经济根本就不按现代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在美国，这一理论由卡尔·波拉尼(波拉尼等 1957)及稍近的特奥多·沙宁(1972)和詹姆斯·斯科特(1976)的著作所代表。他们的主题在于论证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7]

尽管亚当·斯密本人认为小农经济是前商品化的，他的追随者总想把世界的一切社会现象纳入他的古典经济学，不限于发达的市场经济，也包括小农经济。第三世界小农经济在 20 世纪的广泛商品化助长了这种意图。同时，美国在商品化和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家庭农场的组织形式一直保持着，从而形成了英国古典经验之外的另一个农业现代化模式。人们认为第三世界小农经济也会伴随现代农业投入和扩大市场交换而出现“绿色革命”。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为这一种期望提供了